

这并非一部可以用现实主义去度量的名作,那么——

什么才是打开《呼啸山庄》的正确方式

黄昱宁

观点提要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盘点文学史,在《呼啸山庄》之后都很难找到在任何方面模仿它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座奇妙的孤峰,它的风格是如此特别,你找不到化用于其他文本的方式,你连一丁点皮毛都学不到。



二〇一一年版电影《呼啸山庄》剧照

在结构、手法、风格上完全找不到其他作品可以比附、可以借鉴的作品,究竟是怎样横空出世的。甚至,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盘点文学史,在《呼啸山庄》之后都很难找到在任何方面模仿它的作品。在很多人看来,《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座奇妙的孤峰,它的风格是如此特别,你找不到化用于其他文本的方式,你连一丁点皮毛都学不到。

回到女管家纳莉。我们很快从她的叙述中看到了故事核心的轮廓:欧肖家流落的女儿卡瑟琳和老欧肖在利物浦街头捡来的流浪儿希克厉之间,有一段刻骨铭心却又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望的爱情。老欧肖的辞世,长子亨德莱的薄情,让这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成了相依为命的伙伴,跟荒原上的野草一起野蛮生长。在某种程度上,卡瑟琳带给希克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平等自由的幻觉。卡瑟琳左右了希克厉所有的喜怒哀乐。在希克厉看来,征服卡瑟琳就是征服全世界,反过来,失去卡瑟琳就意味着万劫不复。

那一夜,展现在两个少年眼前的是跟呼啸山庄迥然不同的面貌:房间里铺着地毯,天花板上玻璃吊灯,环境洁净、宁谧、富有,没有“奇怪的对比”,惟有有趣的和谐。这一段的插叙是通过希克厉的视角展开的,他看到了屋里的兄妹俩在为无聊的事情温和地争吵,就好像代入某种千篇一律的公式。他一眼就在这温馨祥和的画面中看到了他们的精致、脆弱和缺乏生气,于是发出感叹:“哪怕给我一打生命,我都不愿意跟埃德加·林敦在画眉田庄的境况交换。我们从情节后来的走向可以得知,刚才这一幕,如果视角换成卡瑟琳,那一定是另一种样子。在她眼里,画眉田庄代表着安全、文明、井然有序,他们的生活方式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未来还有另一种可能。我们可以感知,在卡瑟琳心中,两股力量,两种人生,两个‘天堂’开始撕扯她。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才刚刚拉开帷幕。

《呼啸山庄》里的情感冲突,从一开始就没停留在世俗层面。卡瑟琳的选择困境并不仅仅是阶层差距或现实需求,同时也包含着她对自己、对本性的认识。究竟是顺应还是压抑本性,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选择。为了接受林敦的求婚,卡瑟琳也编织了自圆其说的理由。她告诉纳莉,如果嫁给希克厉,那么他们两个只能去讨饭;但如果嫁给林敦,那她可以用丈夫的钱帮希克厉翻身,使其不再受她哥哥的欺凌。

是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女管家纳莉了。她在叙述中的情感倾向很有意思,像墙头草,时而同情希克厉,时而站在林敦的立场上,时而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卡瑟琳评头论足,时而还作为两个山庄之间的中介改变事情的进程。她的态度不仅始终摇摆不定,而且其见识和自由也不像从没见过什么教育的女仆。

或许,我们可以把纳莉看成是一个集体视角——集世俗观点之大成。在这部充满极端人物的小说中,惟有纳莉是我们熟悉的普通人,是凡尘俗世的中间色调。纳莉在某种程度上是替读者发声,我们通过她对整个故事的议论,通过她的反复改变立场,也能审视我们自己的态度,进而体会到世俗的评判与小说展示的灵肉冲撞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落差。当小说让我们产生越来越强的代入感时,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和纳莉一样,既无权也无力作出评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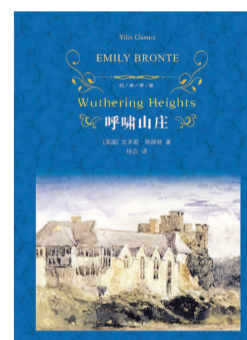
通过纳莉我们看到,两个山庄两代成员的名字、亲缘关系以及性格特征,都紧紧缠绕在一起。希克厉的儿子以他的情敌林敦的姓氏来命名,林敦的女儿则与母亲卡瑟琳的名字相同,而亨德莱的儿子哈里顿的性格和境遇,明显让人联想到当年的希克厉。所有这些爱人、仇人,其实彼此之间都是亲戚。如此重叠和错位,显然是作者刻意为之,直接效果是:这仿佛写成了一个循环发生的故事,两个山庄的第二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上一代的故事。将近百年之后,我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安排,家族里几代人的名字犬牙交错,命运循环往复。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呼啸山庄》并不是一个可以用严格的现实主义规则去

度量的作品。推敲其与现实对应的细节是否符合生活逻辑,并不是阅读这部小说的正确方式。它的故事框架很容易被概括成穷小子与富家女的爱情悲剧——穷小子因爱生恨,进而报复社会。因此,如果我们在其中看到尖锐的阶级矛盾,是顺理成章的。但仅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促使艾米莉创作《呼啸山庄》的灵感并非来自于她自身的痛苦,她的眼里看到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却有力量在书中把它统一起来。如果我们顺着伍尔夫的指引,就会发现艾米莉·勃朗特实际上大刀阔斧地砍掉了生活中很多折中的、暧昧的、半真半假的部分,留下色彩最鲜明的部分,形成最强烈的对照。小说凭借这样的架构,在荒原上搭建起了人类情感的微缩景观。

然而,比这种对照更惊心动魄的,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性和卡瑟琳的理智完全屈服于社会秩序的同时,始终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和情感与希克厉同在,与荒原同在,最终不惜用生命呼应了来自它们的召唤。她在一个世界里越清醒,在另一个世界里就越疯狂。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不仅存于她身外,更常驻她内心。强烈的情感从地下渗透到地上,从文字里散发到文字外。与情感表达的饱和度相比,与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无可言说的神性与诗性之美相比,文本的结构、技术上的特点反而显得无足轻重了。



《呼啸山庄》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杨苡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可是希克厉先生跟他的居处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对比。从模样来说,他是一个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从服装、举止来说,又像一位绅士。”打开《呼啸山庄》,迎面而来的就是这样奇特的、极度不和谐的对峙,处处都是构成尖锐矛盾的画面。时间地点人物事情,每个元素都在拽着你往下看,但你总觉得它们被错位放置,终于彼此交缠,难以分割。

整个故事涉及两个山庄的两户人家的两代成员,真正的时间跨度有三十多年。不过,这个故事并没有从历史讲起。实际上,在小说文本的起点——1801年,两个山庄已经经历过生死剧变。小说完全没有交代两座山庄的具体位置,你只是依稀知道这是两个英国的乡间农场,从环境描写看多半在北部,离利物浦不远。哪怕读完全书,你也很难找到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或与时代风俗、历史变迁直接相关的细节。甚至,你对这两个地方的面积、人口、结构的观念都会比较模糊,规模似乎可大可小。也就是说,这样的时空是

抽象的,是高度虚构化的,所以有人把《呼啸山庄》当作寓言甚至幻想小说看,虽不准确,却也有一定的道理。从书里的描写来看,英国古典文学另两个重要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也好,《简·爱》里的罗切斯特也好,在傲慢和矜持上或许与希克厉有一点相通之处,但显然远不及希克厉阴郁和暴戾。对此,借住在山庄的外来客洛克乌的评价很生动:“他爱,他恨,全都搁在他心里,而且认为假使再要让人家爱他,恨他,那就分明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儿。”周边环境也在不断烘托这个自闭的暴君形象,山庄里总是风雪交加。

呼啸山庄里其他几个人物彼此的关系也显得奇特而紧张:比如,两个在外形和气质上形成鲜明对比,但都被周围压抑的环境苦苦折磨的青年男女;一个粗鲁无情的老男仆。至此,诡异的气氛全开,悬念推着洛克乌和读者往前走。洛克乌发现,惟一可以成为突破口的是女管家纳莉,她从卡瑟琳和希克厉的童年

起就在这家里帮佣。在洛克乌的追问下,她终于从第四章开始,原原本本地叙述起这两个山庄的故事。

由此,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由外围旁观者洛克乌转为纳莉。在她的叙述中,不时需要插入故事中人物的叙述,或他们的来往书信,所有这些信息拼接在一起,才构成这个故事的完整。因此,《呼啸山庄》的整个叙事采取了三重框架,很多段落都宛若多声部合唱。这种结构在后现代文学中并不少见,但在古典小说里显得很超前,以至于小说发表后,结构成了被诟病的一重理由。评论者们认为,小说写得“七拼八凑,不成体系”。

将近半个世纪后,随着20世纪的到来,《呼啸山庄》在评论界受到的推崇越来越多。小说问世之初面临的尴尬境地,有了戏剧性的反转。当初对艾米莉的非议,成了“神化”女作家的依据。人们很难想象,一个“除了上教堂或者到山上去散步”之外很少跨出家门的女性,哪来如此丰富和不羁的想象力;一部

《了不起的盖茨比》曾让菲茨杰拉德走向绝望

孙璐

1937年,菲茨杰拉德走进好莱坞的一家书店,当他发现书架上连一本他的书都没有,他惊愕与不解,开始自我否定甚至濒临绝望:“我厌倦透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名字,一个与金钱绝缘的名字。”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永远的痛。

上世纪20年代初,菲茨杰拉德正春风得意。《人间天堂》的热销和评论界的追捧使他的野心不断膨胀,他渴望享誉世界文坛,更希望赚得盆满钵满来支撑他和妻子泽尔达奢侈生活的巨大开支。1922年,菲茨杰拉德着手策划他的第三本小说,一部能让他名利双收的作品。7月,在跟他的编辑马克斯·伯金斯的通信中,菲茨杰拉德第一次透露了他对新作的期待:“我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一部非同寻常的、美妙的、简约而精致的作品。”此时的菲茨杰拉德还是流行杂志的热门作家,不断大获成功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使他深谙作品畅销的秘籍:“一个作家该为谁而写?应是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下一时代的批评家,以及之后不同时代的中学教师。”1924年8月,旅居法国的菲茨杰拉德在南部小城圣拉斐尔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在寄给伯金斯之前,他又花了两个月对它修改,从故事架构、情节设计、到场景描写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我删掉重写的那些内容几乎能构成一部新小说。”

《了不起的盖茨比》曾被寄予的厚望、倾注的心力,以及精益求精的打磨,多年后已被评论界公认为成就其卓越的缘由。然而,对菲茨杰拉德而言,这些只不过加剧了小说出版后他的失望。1925年4月2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后的第十天,伯金斯给菲茨杰拉德发来电报:“书评反响尚可,市场销量不太乐观。”事实上,此时的评论界虽有褒赞的声音,但更多的是不温不火的评价,甚至不乏质疑。有评论称“小说读起来夸张怪异,不时露出廉价小说的痕迹”;有人将其归为二流作品,因为“小说没有激动人心的沸点、

没有醇厚与深刻的回味,作者显得有些无聊和倦怠”,甚至调侃它不如干脆把题目改成《长岛的十个夜晚》;还有批评称“小说过于散漫与孱弱,矫揉造作的刻意感会让它很快被人遗忘”;就连菲茨杰拉德的好友H.L. 门肯在肯定小说人物塑造、细节描写等写作的亮点后,依然遗憾地声称“《了不起的盖茨比》难以比肩诸如《人间天堂》这样的杰作”。伊迪斯·华顿私下与菲茨杰拉德通信,指出他对盖茨比的刻画还不够“了不起”,盖茨比最终的结局也缺乏“悲剧性”,读起来更像是晨报角落上的一则“社会新闻”。市场的反应则更令人沮丧,小说出版当年只卖出了两万册出头,不及《人间天堂》销量的一半,而同年其他畅销书的销售体量都是数十万册计的。直至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时,签约出版社的仓库里还堆着卖不出去的重版库存,要知道再版的数量仅仅3000册。

惨淡的销量给菲茨杰拉德带来的不仅是失望,更多的是困惑。在给伯金斯的信中他自我剖白,将滞销归因于小说缺乏正面的女性人物,因而无法引起女性读者的兴趣;他还抱怨说小说之所以反响不好,都是书名的错。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出版社为小说选定的题目,菲茨杰拉德对此很不满意。在他看来,相比他自己拟定的几个题目——《西卵的特里马尔乔》《通往西卵之路》《戴金帽子的盖茨比》和《一飞冲天的爱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题目“含糊其辞且不够充分,虚饰有余而精准不足”。但菲茨杰拉德最终说服不了伯金斯和出版人,妥协接受了这个名字。

期待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菲茨杰拉德一度消沉,酗酒的恶习再度升级。余生的十几年,他非但没有封上他毕生追求的“伟大小说家”的标签,更是几乎被市场和读者抛弃。1937年,菲茨杰拉德



走进好莱坞的一家书店,当他发现书架上连一本他的书都没有,他惊愕与不解,开始自我否定甚至濒临绝望:“我厌倦透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名字,一个与金钱绝缘的名字。我很想知道,人们读我的作品是不是只因为我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或者更可能的情况,因为冠上了这个名字,他们不愿读我的书。”

“《盖茨比》还有机会吗?如果把它加进一个畅销书系列再版发行,请一位欣赏它的人(而不是我)为它作序,能否为它赢得课堂、大学教授、或任何英语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它就这样死了,尽管一点都不公平,它却彻彻底底地死了,哪怕我们曾为它付出了那么多。”这是1940年5月20日菲茨杰拉德写给伯金斯的信。

七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他不得而知的是:过不了五年,《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仅在上世纪40年代,它就有17

个新版或再版发行,并开始走进高中和大学课堂;1960年,《纽约时报》将其定义为“20世纪美国小说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它已累计卖出近3000万册,单部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倘若菲茨杰拉德还活着,他完全可以在版税里打滚儿,而不是拿着最后一笔仅有13美金的版税支票抱憾而逝。

促成《了不起的盖茨比》命运转折的是二战。美国参战后,美国红十字会同出版业合作,推行了一项“口袋书”计划,一批篇幅不长、可读性强的小说印成了小开本,寄往美军前线。截至1945年,共计12300余册《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分发到了士兵手里,同是一战军官的盖茨比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这些年轻的战士不仅被盖茨比奋不顾身的爱情故事打动,更透过菲茨杰拉德对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描述,仿佛预见到他们打完仗回国后的样子。如果等待他们的和喧嚣的20年代如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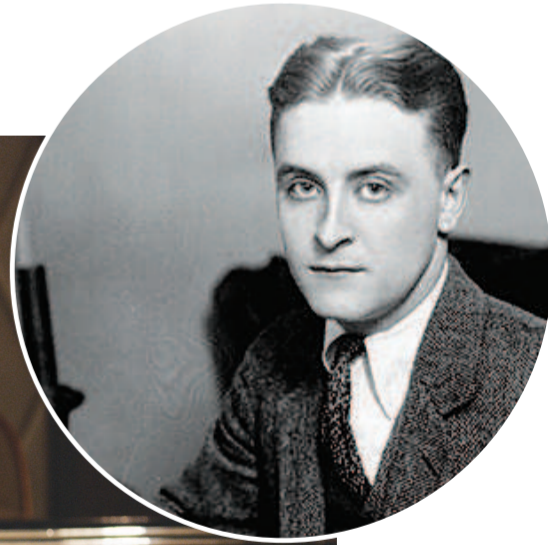
辙,那么在一个国力兴盛、物欲横流、价值真空的社会,他们将何去何从?如果力争上游、致富成名的梦想本身无厚非,那么为实现梦想而不择手段、梦想成真后纸醉金迷的生活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如果盖茨比的执着坚韧令他们心生敬意,那么盖茨比令人唏嘘的结局是否也让他们不寒而栗?

“盖茨比相信那绿色的灯火,相信那复一年离我们而去的令人迷醉的未来。它在过去曾从我们身边溜走,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明天我们将更快地奔跑……终有一天——”小说结尾,菲茨杰拉德将盖茨比的故事变成了“我们”的故事,为将近一个世纪及未来若干年后的读者举起了一面镜子。从一个恃强凌弱、暴力与腐败泛滥的世界,一种物质至上、信仰蒙尘的社会氛围,一种贪婪恣意、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我们”若隐若现地看到了当下。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条不断攀

爬、又不断下坠的生命轨迹,一种充满乐观与希望、却注定消逝与幻灭的宿命感,“我们”同样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己。一定程度上,这种重现是否也印证了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最后的预言:无论“我们”多么“奋力地向前划”,也无法阻挡“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或许正是这个不免扫兴的“预言”让《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问世之初备受冷落,毕竟沉浸于20年代流光溢彩的人们不会相信,经济大萧条的乌云正在积聚,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世纪寒冬。或许正是这个具有跨时代警示意义的“预言”让《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历久弥新的世界文学经典,一代一代的读者从中获得启迪,又在不断更迭的新时代一次次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过去。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菲茨杰拉德不得而知的是,他去世后过不了五年,《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家喻户晓的小说,单部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